地方的時代與文化的時代
—以地方為主軸的文化政策思考

■財團法人文化環境基金會

我們最終追求的，是一個有地方、有社區、有個性、有魅力、有創意的生活大國，而非庸俗煩悶緊張的經濟大國；這一切只有在社區民主和地方自治的基礎上才可能達到。

美麗之島的蛻變

台灣原來是個美麗島，西方人把她叫做「福爾摩莎」，可是如今，這些當初把台灣命名為美麗之島的西方人，恐怕已經沒人叫的出這個名字了，尤有甚者，還把台灣形容為豬舍。曾幾何時，台灣怎麼會由一個美麗之島淪落到這個地步。

美麗的台灣如今不再美麗，原因何在？因為經歷了這麼幾十年，台灣島上突然增加了許多非自然的景物，這些景物都是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所生產出來的，包括建築物、道路、山坡地的檳榔樹、河川中的垃圾、海濱的消波塊、污染的空氣、劃地而過的大工程。土地是上帝對台灣人的恩賜，台灣人被允許利用這塊土地做為他們的生活環境，台灣人在土地的庇蔭之下，為了自己子孫的將來，不只應該保護這塊土地，更積極的目標是要讓台灣人在這塊土地上為了生活所營造出來的景物，不但能夠整合到這塊島嶼的自然之美中，最卓越的成就則在於使得台灣人工生產的景物比起自然更美麗，或是因為這些景物的存在而使得自然呈現得更美麗。如此，才不虧上蒼賜給台灣人這塊福爾摩莎美麗之島的美意。

盲目發展工商不如厚植文化土壤

台灣的經濟和工業雖然日益發展，直逼世界先進國家，可是大部分的外國人和本國人都愈來愈覺得台灣是個令人感到煩悶無聊的地方。因為都市的景觀大部分都雜亂無章，鄉村風格逐漸消逝，街道千篇一律，文化活動數量少品質難提昇，不論在視覺或活動的感受，都很難吸引人。雖然政府說要把台灣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甚至希望它變成一個「科技島」，聽起來卻很令人擔憂。要把人留住，尤其是高級人才，一定是這個地方的生活環境是吸引人的。如果台灣的環境都不能把人留下來，那又怎能成為亞太運營中心？難道我們的科技島都要由機器人來操作？

如果台灣不能同時建設成一個適合文明人類生活的美麗島，她就不可能成為亞太

營運中心和科技島。不以生活和文化為建設目標的國家發展政策，亞太營運中心或科技島這樣的計畫，註定是要與優質的生活相矛盾的。一味地以科技、工業及開發為最優先的考慮，無可避免地將與生活和文化環境的營造互相衝突。當河流污染、山坡濫墾、空氣混濁、違章處處、交通阻塞、治安敗壞、景觀破碎時，這樣的環境連自己人都留不住而要移民國外了，還有誰願意到這裡來？台灣有過不少成就，可是我們也看到繁榮表面中的敗絮。

除了實體環境之外，文化的豐富性也不斷斲喪。來到台北之後，台灣其他的城市都可以不用去了；看過台北市的一條街道，其他地區也不用再看了；走過一個小鎮或村莊，台灣其他地點都可以省掉了。因為整個台灣各地的文化面貌都是大同小異，沒有什麼吸引人的獨特風格與個性。我們不但覺得沒什麼地方文化的樂趣，甚至會嘆息台灣人文化的想像力怎麼如此枯竭。在這樣的地方，即使人們教育程度再高，經濟所得再多，那又有什麼意義？對台灣人做為一個世界公民的一分子，又有什麼值得驕傲？文化的豐富性在於地方的多樣性和社區人民創意智慧的凝聚。一個失去文化創造力的社會，即使變成科技島和亞太營運中心，又有什麼光彩可言？那種僵硬冰冷的環境會是人類值得驕傲的成就嗎？

這塊島嶼要容得下美麗島的景觀和豐富的文化風貌，空間都已經不夠了，她怎還有剩餘的環境讓各種大型的工業發展與科技開發去揮霍？生活與文化，才是我們在這塊島嶼從事一切努力的終極關懷與目標，可是我們曾經努力做過什麼？我們不該盲目地發展工商，而應是細心地去思考如何厚植文化生活發展的土壤。

文化政策的地方化

文化事務在所有行政事務中恐怕是最具地方性的項目，因為所有文化活動不論號稱為國際性或全國性，一定總得發生在一個場所，這個場所不論是個舞台劇場，或是個展覽空間，都必然是在土地上，而土地就是地方。她一定跟當地的人民和當地的政府有關。而參與的人口也必然大部分是當地社區居民，辦理單位或團體也多少與在地合作對象有關。所以說，文化是最具地方性的活動和事務。

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可是在台灣卻常常有人忽略的這些事實，尤其是沉湎在台北的文化人和知識份子，在他們看來，也許只有台北才有文化。即便如此，他們也不覺得台北是個「地方」。潛意識裡，台北變成是脫離了土地而懸空的抽象概念，換句話說，台北代表了台灣，台北代表了全國。既然如此，台北就不可能是「地方」，「台北」，對很多人而言，恐怕是個抽象名詞。

所謂「中央政府」也有這種問題，大家以為台灣這塊土地是中央政府在管的。實際上，中央政府是位在抽象的台北，它雖然是位在台北市的土地卻無直接的管轄權，中央政府從總統府到行政院，都位於台北都發局及相關市府局處所直接管轄的範圍內。當台北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屬不同執政黨時，我們就經常看到這種矛盾。將來，文化的事務也會如此。

然而，從積極的一面來看，文化發展卻是地方政府最佳的最佳選擇。因為，地方可以超越中央，地方可以做得比中央好。

什麼是中央？什麼是地方？有影響力的就是中央，沒有影響力的就是地方。當宜蘭的冬山河成為台灣各地所羨慕而成為一心想模仿的典範，那麼冬山河便是中央，以那裡為中心，放射出影響深遠的光芒。

我們觀察過去幾年來的文化政策，可以發覺地方的主體性越來越被強調。中央的文建會所推動的十二項計畫中是以地方為導向的文化政策轉型，將觸角擴及鄉鎮基層社區，以縣市文化中心為據點，藉由互相支援的幾個不同計畫方案，從單純的人文藝術生活之滿足，提升為社會群體美學和共同體倫理之重建。這種文化政策的思想與早期意識型態化或教條式儒家倫理的教化思想並不相同，而是走向更為務實的地方社區層次與行政技術的講究，這也是包括全國文藝季、社區總體營造與街區環境改造相關計畫在地方可以落實的前提。這些計畫轉從地方出發，帶動了全然不同的文化視野。例如「全國文藝季」轉為由各縣市自行舉辦，並且與地方人文特色及社區生活相結合，讓精緻藝術有鄉土的養料，也讓鄉土民藝有精緻化的動力。而「國際小型展演活動」則扭轉了只有中央才能進行國際文化交流的看法，讓地方以本身人文特色為基礎，舉辦國際藝文活動，越過中央層級與世界各國藝文團體進行交流，同時在交流的過程中，更加刺激本身的藝文發展。包含了「社區文化活動發展計畫」及「輔導美化傳統文化建築空間」等包括軟硬體計畫在內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則更進一步強調地方有機整體的特性，強調由文化、產業、環境等不同角度切入，整體地促成地方環境的改變，建立各社區成為具有文化魅力的生活家園。

不管是文藝季、國際小型展演活動或個別社區的營造計畫，基本的策略即在「發展地方文化特色」，背後的想法則在「培養文化藝術發展的社會基盤」，同時「創造公民文化」。「發展地方文化特色」此一策略與八〇年代之後日益加劇的「全球化與地方化」的趨勢相合，在世界文化接觸愈益頻繁的同時，每一個文化體的文化特色將是個體辨認自我形貌、建立自我認同的憑藉。事實上，文化施政的地方化並不是狹隘的地方或本土主義，在日益現代化的台灣，我們所擔心的不但不是地方主義的復甦，反而是太過於一致化和標準化，甚至完全失去一個有活力的文化型態所必要的多樣性及特殊性。

雖然，中央的文化部門已開始體認到文化的地方性，然而面對地方時代、文化時代的來臨，整個政府還是沒有準備好。我們知道，文化在我們國家的國土計畫、經建計畫、都市計畫或是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中，向來幾乎都只是聊備一格。我們希望把這個文化性的議題和內涵整合到我們全國的或是地方的國土開發計畫和地方綜合發展計畫中，讓文化能夠在國家和地方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

地域文化計畫的實踐—宜蘭經驗的啟示

過去幾年來我們對於文化發展的看法，在許多方面已有相當大的轉型。首先是文化發展的內涵不再侷限於美術、表演、文學等藝術領域，文化與空間改造、產業發展及社會轉型的整合關係獲得更大的重視。再則，文化發展的啟動機制逐漸由中央走向地方，地方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主體性在這幾年中明顯的崛起。也因此當我

們在思考台灣文化政策與文化實踐的課題時，有較以往更豐富更紮實的題材。在這個過程，我們不得不提宜蘭在這幾年的文化經驗。

宜蘭的文化經驗包含了鄉土語音、鄉土教材、地方傳統的重建、公共建築與公園休閒區等屬於地貌改造的宜蘭新建築運動，動態的部份有國際童玩節、歡樂宜蘭年、名校划船賽和社區總體營造博覽會等。從台灣區運動會的舉辦開始，文化活動就與這裡的公共空間，地域振興和行政能力充分整合起來，「以文化帶動整體縣政的發展」成為前縣長游錫堃執政時期的最大特色。在這段時間宜蘭也擴大了縣民的國際經驗，增加了文化設施的多樣性，以及精緻藝文活動的普及化。就這樣宜蘭從一個偏處台灣一隅的地位，藉著以文化為地方施政主軸的設計，展開了一系列地方振興的行動計畫。如此，宜蘭崛起為台灣地方發展的一個特殊典範，而宜蘭人也因此建立起自我的信心與光榮感。這在台灣近代發展史上這也算是一個異數。

從宜蘭經驗中，使我們所感到興趣的，不是宜蘭地方有多好？或宜蘭文化成就有多高？而是宜蘭如何使這些事情成為可能？宜蘭個案的研究如果能夠啟發我們關於文化藝術在地方整體施政中的角色，以及地域文化計畫內在機制的建立，那麼得到的啟示對於我們對文化政策的思考可能會有更大的幫助。宜蘭人口不過四十幾萬，但宜蘭的文化經驗不禁對於台灣地方文化發展計畫的潛力產生無比的信心。如果台灣其他類似規模的縣市或城鎮也像宜蘭這樣投入於文化主體的地方施政，我們相信台灣不久即可恢復福爾摩莎美麗之島的盛譽。

開啟一個新的地方時代與文化時代

傳統中國的中央帝國統治型態，在政治社會的意理上一直是「先有中央，才有地方」，或是「先有政府，才有民間」。即使台灣近一兩百年來的政治經驗，也未曾脫離此種傳統。今天雖說已經邁入民主政治時代，一般人民還是不自覺地認為中央和國家才是所有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重心。地方對中央權威的依賴，民間對政府資源的寄望，並未有太大的改變。此種型態如果不加以改變，要世人相信我們已經是民主國家，恐怕也是形式多於實質。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其民主的表現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而不只是存在於對中央首長和國會議員的投票選舉行為上。那真正生活化的民主型態在哪裡?當然在我們居住的社區，和工作的地方。當我們走入城市小鎮或是鄉村山區中，不難發現民間的潛力和智慧，也可以看到地方的可能性和想像力。一種釋放力量的機制一旦可以設計出來，我們仍然可以依賴著社會集體的理性，來規範這個政府與政策。即使是菁英的民主也需要依賴這股力量做為後盾。

不僅政治如此，就是經濟建設也不例外。我們看到橫斷縱切這塊島嶼的工程計畫，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各處成塊成區的工業和休閒開發計畫也蠶食鯨吞著曾經美麗過的國土，不論對錯，這片可愛的國土已經很難再回復原來的面目。我們自以為美國、日本、西歐都是如此。事實上，剛好相反。她們仍然有著美麗的鄉村、田園、河川、地方、傳統與文化。這些自然的資源、地方的魅力、文化的傳統，終究

才是一個偉大國家的真正永遠的「資產」。這些國家的發展目標，往往是在生產更豐富的文化資產，製造更永久的傳統。看來，我們的發展政策如果不再以平衡的角度來看問題，恐怕要比過去歷史的任何時代留給後世的創傷更重。我們仍然在犧牲自己的國土資源與地方傳統、只為了換來一點平均國民所得和外匯的增加，然後再花更多的錢到先進國家去欣賞她們的國土資源，去享受她們的文化傳統。

儘管情況並不怎麼樂觀，在台灣仍有許多可愛可敬的地方和社區人民，包括宜蘭經驗，都謙卑地想告訴我們許許多多的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台灣就像許多我們所欣羨的先進國家，在工業化、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務方面，仍有一條不同的途徑值得大家去省思。我們要發展，我們要提高所得，但是我們更需要保護這片國土資源，更需要重建文化傳統。我們最終要追求的，是一個有地方、有社區、有個性、有魅力、有創意的生活大國，而非庸俗煩悶緊張的經濟大國。這一切也只有在社區民主和地方自治的基礎上才可能達到。因此在國家發展政策的思考上，我們正期盼著開啟一個新的地方時代與新的文化時代。 ◎